

## 西瓜厂

严年丰

西瓜厂，也称瓜厂，并非生产西瓜等各种瓜类的工厂，而是搭建在瓜地里让管瓜人住的棚子，其主要的搭建材料是几根树干及竹片、稻草。用树干作为棚子的柱子和梁，棚顶和棚子的三边扎上几根长竹片，在竹片外再铺挂上厚厚的稻草帘子，只留出棚子的一边让人进出。棚子里面放一张竹片床，棚子搭得够大的话，里面还留出一大块地方，用以放箩筐之类的工具。

上世纪，田里一年中基本上只种一季西瓜，西瓜上市最早在6月底7月初，到8月初西瓜就快落市了，不像现在因为在大棚里种，西瓜上市的季节很长。那时，每年春天，生产队都会留一块足够大的田，不种早稻而种上各种瓜，到了那紧张而又繁忙的“双抢”时节，生产队可以不断地将收摘上来的西瓜、脆瓜等瓜类，分给社员们，让会计记上账，待秋收后年终总结算。生产队长偶尔也有因为在田头劳作的社员们太辛苦了，摘些脆瓜慰劳大家。因为那时西瓜贵于脆瓜，队长是不舍得用西瓜慰劳大家的。而现在夏天市面上的脆瓜贵于西瓜，那是因为种脆瓜的人很少，物以稀为贵。

1968年底，我作为知青插队落户务农。因我动过胃部手术还不到两年，当时医生曾嘱我长期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。所以到第二年的夏天，快到“双抢”时节时，为照顾我，生产队长让我在西瓜厂看管瓜地。

管西瓜厂，一防外人来偷摘瓜，二防野狗之类小野兽来糟踏。就这样，白天我看管西瓜地，夜里也睡在西瓜厂里。

白天还好过，巡视瓜地，看见有西瓜长成拳头般大了，就拿些稻草盖在其上，以防止被太阳晒得太猛而枯萎；老农摘瓜时，帮助他们收拾收拾摘下来的西瓜、脆瓜等；平时也只要稍稍清除一下地里杂草即可。闲时拿本书躺在竹片床上，看小说消遣，或解答题度时光。之前我已自学了一遍高三数学《平面解析几何》，又搞到了一本题集，因此就利用管西瓜厂的间隙，再一道题一道题做下来，借此复习。

难过的是夜里睡在瓜厂里。一是怕。尽管是在夏天，没有月亮的时候，大多数的日子里也是繁星满天，但毕竟是在旷野里，而当时山头上还有零星的野兽。二是蚊叮虫咬。满地的瓜藤青草，西瓜厂被包围在中间，蚊子、虫子非常多。每到夜幕降临，帐子外蚊子的嗡嗡声胜过轰炸机声，钻进帐子里面的蚊子也不少，还有各种小虫子。用手电照着，劈劈啪啪，只有先把它们消灭了才能睡下。但过不了多久，帐子漏缝了，蚊子、虫子又钻进来了……也怕蛇。当然，夜里睡在旷野中也有乐趣，鸣虫啾啾，蛙声阵阵，整夜整夜地为我奏乐。

就这样，直到立秋后瓜地也被翻耕要种晚稻了，我管西瓜厂的任务才结束。那一年我的工分底分是3.5分。而那一年我已22岁了。跟西瓜打交道的这段日子里，也使我跟着老农初步学会了凭眼看、手掌拍打来判断西瓜熟不熟、好不好的本领，至今受用。

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在人生的旅途中会碰到许多次危险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我就有三次可怕的经历，但是都化险为夷。

第一次发生在孩童时。我家后面的宁高专地，那时是一片农田，现在的西湾路及胜丰小区地段，过去有一条宽阔的河流叫盆子河。我们小时候，每当夏天，经常会在河边游泳；到田里捡田螺，捉黄鳝泥鳅；去草丛里抓蜻蜓蚂蚱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记得有一年正逢旱灾，农家都用脚踏水车抽河水灌溉稻田。那天下午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又来到盆子河边玩。原来宽阔的水面现在变得又窄又浅，河床泥涂开裂，乱石成堆，只有在放置水车的河边还有水在流动。在一个槽子头上，有一条黄牛的大眼睛被两大片毛竹片蒙着，肩头扛着碗口粗的木制长杆，不停地围着水车的中轴转圈。槽子头平台边，水车的木槽斜向直插河底的水中，木槽中有一格一格的木片，在牛的牵引下，就像转动的链条，把水流不停地输送到岸上的水渠中。我光着脚丫子，踩在出水口底下的石板上，让潺潺流水哗哗地浇到脚上，感到十分惬意。

## 莲蓬

任彩

“秋江岸旁莲子多，采莲女儿凭船歌。”秋天是采摘莲蓬的季节，莲蓬又名莲子肉、藕实，是荷花的莲房、花心，娇小嫩黄，藏于美丽的花瓣之中。盛夏之后，荷花的花瓣渐渐脱落，便会变成一只只碧绿的莲蓬。中国人对莲蓬的喜爱自古已有，观音盘坐的莲花座，就是一只硕大的莲蓬。莲蓬里多含莲子，而莲子是“连子”的谐音，莲蓬包含了多个莲子，古人寓意为“多子多孙，子孙满堂”。

乡间的莲蓬，只要长成，孩子们往往惦记再三，最终找到机会去采摘。诗人辛弃疾“最喜小儿无赖，村头卧剥莲蓬”，就生动地表现了乡间儿童的快乐与顽皮。

我小的时候，每到夏季必跟随哥哥划着木盆到荷塘里采摘莲蓬。一方阔大的荷塘里，密密麻麻的荷叶遮蔽了整个水面，鲜艳欲滴的荷花亭亭玉立着，红花翠盖相映成趣。有的荷花盛开得正旺，有的已经珠胎暗结。因为有过掉下水的经历，所以我只能在池塘边坐享其成。哥哥自小在农村长大，钓鱼、捉鳝、采莲、打鸟，无不精通，采摘莲

……突然，我感到一阵晕眩，一下子失去了知觉，意识中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高高地提了起来，又轻轻地放了下去。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人却坐在了遍布乱石的河滩上，身边是石块砌的高高的水车槽子头，落差有好几米，牛还在上面不停地转圈。我站起来活动身子，没有感到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。是什么力量瞬间把我从岸上拽了下来，而且毫发无损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

如果说小时候的这次奇遇有点神秘色彩，那么支边在新疆去林子里打柴遇到塌房经历，才是实实在在的危险。

新疆的夏天，尤其是中午的气温更是炎热难当。为了避开高温，午后都要休息。在林中打柴的人们都住在简易的地窝子内。地窝子的房顶是用胡杨树干做横梁，铺上树枝、苇子草，再盖上一层厚厚的沙土。地窝子冬暖夏凉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因陋就简，感觉还不错。新疆气候干燥，雨水稀少。那天却淅淅沥沥地下了雨，我们因雨停工。午休时，我在床上一边休息，一边收听小收音机里播放的“革命样板戏”，渐渐地进入了梦乡……突然，一阵“吱咯吱咯”的断裂声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睁开惺忪的眼睛，去寻觅声音的来源，看到在床的上方那根横梁有一条缝正在裂开，逐渐扩大！我立即翻身下床，冒雨跑了出来，想在外边找一根柱子顶住横梁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房顶的一部分塌了下去，全都砸在我刚睡过的床上，扬起了滚滚的尘土。如果晚了一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周围的人们闻声都来帮我清理地窝子，虽然被子、床单、衣物都像出土文物，面目全非，但是枕头边的收音机却还“欢唱”。命运之

神再次庇佑了我。

岁月轮回，1983年5月我全家迁回宁波落户。198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，春雨绵绵。我全家被邀去朋友家做客，当年朋友家住在槐树路范江岸那边，要过解放桥。在朋友家里酒足饭饱尽情叙旧后回家，已近深夜了。我用一辆自行车带着妻子和七岁的儿子，骑行在濛濛的细雨中，昏暗的灯光照射在雨雾中更显得迷茫茫茫，周围万籁俱寂。因大桥坡度比较大，妻子下车后落在了后面，我带着孩子推车过桥走在前面，我在桥的右边过了桥中心正在下坡时，妻子忽然在后面大声疾呼：“快让开！有辆手拉车冲下来啦！”我想桥面这么宽阔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回头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原来是两辆前后连在一起的手拉车，上面装满了长长的钢筋，其中有一根向右弹出横在路面上，呼啸而下！我一时大惊失色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这根钢筋一下子打在我的后腿肚子上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我跟着没有跑出多少路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，一松手，自行车和儿子顺势滑倒，我仍然被这根钢筋拖拽着，和桥面、水坑、柏油马路进行亲密的接触，一时间天昏地暗天旋地转！等推车的人把车子制服，我竟然在永丰路上的原六中门前，被拖带了一百多米！妻子惊得魂不守舍，在我的耳边不停地哭喊：“哪里疼？”我回过神来第一句话是：“儿子怎么样？安全否？”不知是谁报了警，不一会儿有交警前来处理事故，我除了磨破了衣裤，皮肤有一些轻微擦伤外，一切安然无恙！按当年的物价，仅仅给了我们区区五元钱的赔偿。金钱是小事，安全是大事，我又一次逃过一劫。

本版摄影 胡龙召



总第 5171 期

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芮成钢 著 40

虚实之间

当你接触移民美国的日本人、韩国人，常常到了第二代第三代，依然叫的是本国的名字，什么小渊惠五，金正西。即将接替佐利克成为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韩裔美国人金庸，5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，现在依然沿用自己的韩国名字Jim Yong Kim。而中国人往往从第一代移民开始，就改了美国名字，更别说二代、三代，比如在美国出生的Gary Locke（骆家辉）和10岁时移民美国的Elaine Chao（赵小兰）。

后来中国改革开放，港台风迅速吹遍了我们的文化阵地。写字楼中各种Henry各种Lucy遍地开花。再后来不仅外企，国企也兴起了洋名之风。

记得我们小学时的英语教材里写，对外国友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要把名字放在前面，姓放在后面，这挺傻的，不好玩儿。我走到任何地方自我介绍都是芮成钢，不叫成钢芮。有时候别人会喊错，我纠正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中国人的first name就是他的family name。”其实我们自己尊重自己的传统，别人才会愈加尊重。

所以我建议咱们到了国外都保持姓在前名在后的传统，不必为了外国人的方便作任何改动。除了姓何的女士和姓余的男士可以特别处理一下（否则Mr.She或Mrs.He容易引发歧义），名字直接用拼音即可，不用担心有一些音他们发不出来，也别“成钢芮”、“雪芹曹”。假如真想跟咱们打交道，这些障碍都能克服。这是对自家文化的自信和尊重。你越尊重自己，别人越尊重你。

我一直期待有一天能做这样一个访谈，我几乎不用开口，只是往那里一坐，出于对我的信任，或者某种气场的感染，对面的受访者就愿意说出他想说的一切。正如武侠小说中的高手，驭人无形，袭物无声。作为一个对话者，我很向往这种“功夫在诗外”的境界，因为，一个处于新闻事件中心的当事人，就这个事件所说的任何言语，都是有价值的，关键在于他是否愿意对你开口。

要与受访者实现有效交流，需要做很多工作，包括前期准备，现场信息的捕捉处理，认真聆听，即时发挥，也倚赖于记者的知识储备、思想水平等等。

用英文提问并不难，特别是在有团队替你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，机械的一问一答充其量算作“会话”（Dialogue）。真正的对话（Conversation），要求你不仅听懂对方说的每一句话，还能听懂言语里的无奈、犹豫，听出言语中的漏洞和闪光的地方，从而与对方在同一层面上深入地交流。我的很多受访者，之所以还能饶有兴趣地和面前这家伙聊下去，这是很重要的原因。

当然这需要经验的沉淀和时间的积累。刚出道的时候，无论语言本身还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体系，对我而言都存在障碍，很难深入核心问题。

细心观察是了解对方的捷径。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他胸口挂着一个胸针，上面写着数字1。按照中国的习惯，很容易联想到这意味着他是马来西亚的“1号首长”。当时我让摄像给这个胸针特写，然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他告诉我，不是“马来西亚1号”，而是“一个马来西亚”。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文化多元，彼此易生争端，“一个马来西亚”，号召国民团结一致，不要窝里斗。

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总裁拉加德女士的交流则更为有趣。那时她还是法国财政部长，准备竞选IMF总裁。在我眼中她是一名魅力十足的女性，我甚至很看好她成为未来的法国总统。于是我对她说，作为记者，我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竞选者，但是作为我个人，我很支持你的选择。这个位置很难做，因为众口难调，所以像您这样优雅的女性十分适合。至少在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都不好意思不接您的电话吧？

那一番话说得她十分受用，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的支持分外感激。我们第二次见面时，她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IMF总裁，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一点也没变。”我说您可是变了，身边多了两个保镖。她表示她也不喜欢，但是没办法。我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对她讲，她拎的爱马仕铂金包，是中国十大恶俗品牌之一，她也笑着说：“在国外，只有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才会选择这一款。”

责编 胡晓新